

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

闫润鱼·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01JA810021)

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

闫润鱼·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 / 闫润鱼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80225-296-7

I. 自... II. 闫... III. 自由主义—研究—中国—近代

IV. 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0698 号

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

闫润鱼 / 著

责任编辑: 刘 刚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嶷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960 × 1300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34 千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一版 200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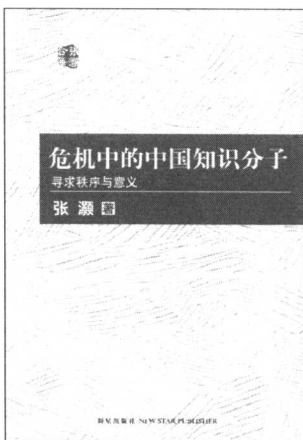
印 数: 0 001~5 000

书 号: ISBN 978-7-80225-296-7

定 价: 29.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作者:张彦

这是一部关于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领袖人物——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的研究论著。这四位人物都在此时期以不同方式扮演了思想界的主要角色。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凸显了一种使他们的思想得以超越那种流行于中国知识界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中的民族主义的世界观。一并分析这四个个案，可以从一个新的视野来审视他们的思想和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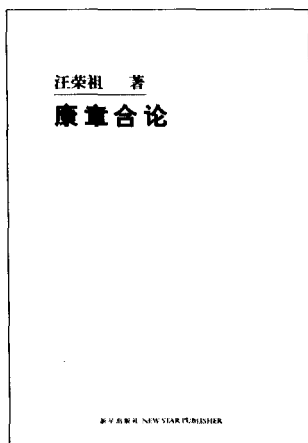
《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



作者:黄克武

本书以梁启超《新民说》为基本史料，分析梁氏思想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意义。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趋势来看，梁氏代表的是温和渐进的“调适”思想，而与谭嗣同、孙中山等人主张激烈变革的“转化”思想有所不同。作者认为 20 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正处于这样一个思想抉择的关头，开始之时两者势力相当，其后愈来愈多的人放弃了梁启超的“调适”思想，采取革命派的“转化”主张。此一思想的变迁，并配合其他的外在因素，造成了近百年的革命与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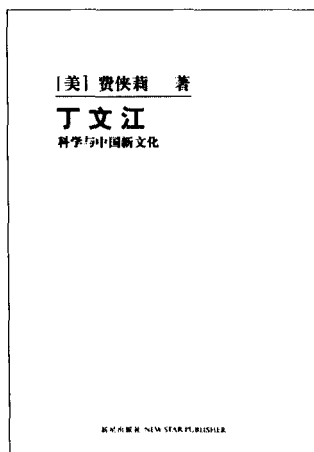
《康章合论》



作者:汪荣祖

康有为、章炳麟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卓著的一对人物。他们虽属同时代之人,但无论在性情上和思想上,都大不相同。虽然如此,却各从不同的途经,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解放,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而在民国成立之后,却又同被新生代知识分子视为守旧和顽固。但无论如何,两人所提出的两个文化观点,一直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两个方向。是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现代文明?还是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

《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



作者:[美]费侠莉

丁文江其人很难归于哪一类人物。他是旧中国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科学家中最著名的先驱者,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北京学术界的一位领袖,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此外,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孔儒思想的熏陶。他的一生事业受着两种努力的支配,而且从未顾此失彼:首先,他奋力搞清楚现代科学及其对中国旧文化秩序的影响;其次,作为念念不忘孔儒治国之道的精英,他锐意寻求有意义的行动方法。

目 录

绪论	(1)
一 研究现状	(1)
二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本书的基本框架	(19)
第一章 自由主义的产生及其思想特征	(22)
一 自由主义的产生	(23)
二 自由主义的流变及其思想特征	(33)
第二章 会通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	(44)
一 传统文化中的自由观念成分	(45)
二 自由主义如何舶来中国	(53)
三 会通中西文化中的自由观念	(63)
第三章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84)
一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	(84)
二 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100)
三 在强权政治下的自由守望	(118)
第四章 自由主义者的政党思想与实践	(142)
一 政党政治环境与自由主义者的参与特征	(143)

二	旨在“征伐国会”的政党实践	(148)
三	旨在“舆论干政”的政治集结	(159)
第五章	自由主义者的舆论阵地	(174)
一	《努力周报》:努力谈政治	(175)
二	《现代评论》:在乱象中保持理性	(192)
三	《新月》:挑战一党专政	(208)
四	《独立评论》:推动中国政治上轨道	(225)
五	《再生》:“修正”民主政治	(257)
六	《观察》:培养自由思想种子	(276)
第六章	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	(304)
一	关于自由的价值	(305)
二	关于个人的权利	(315)
三	关于自由与宪政	(324)
主要参考文献		(337)
后记		(346)

绪 论

一 研究现状

关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成果多出自海外和台湾学者之手，如史华慈等著《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等。进入 90 年代后，随着学术多元化趋势的确立，该领域的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经过十多年的耕耘，现已取得丰硕成果。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做整体性研究的著作有：胡伟希等人合著的《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刘军宁的《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任剑涛的《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石毕凡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等；以某位或某派自由主义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有：欧阳哲生的《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张晓唯的《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 年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章

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何卓恩的《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等；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资料汇编有：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李世涛主编的《知识分子的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等；论文则不计其数。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的特性

所谓中国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舶来品，这在研究者那里有高度的共识。不过，中国的自由主义究竟有哪些特征？它是在什么时候兴起的？兴起后是否已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在这些问题上大家的持论有明显分歧。

殷海光是最早为中国自由主义概括特性的研究者。他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是“翻版”的自由主义，它不仅“先天不足”，且“后天失调”，对于这样的自由主义事实上不能用西方“原版”的自由主义标准来判定，否则，中国的自由主义一定是“少之又少”。在这个前提下，他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标出六条性质：抨孔、提倡科学、追求民主、好尚自由、倾向进步以及用白话文。并主张在具体的研究中，只要研究对象在某阶段的思想合于其中之四条，即可以“将他放进‘自由主义栏里’。”〔1〕殷海光的看法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深化相关研究的基点，如欧阳哲生认为殷氏的六条有太过宽泛之嫌，他本人则将中国式自由主义的特征概括为：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中强调以个人为本位，在社会渐进与激进革命的选择中主张以改良为

〔1〕 殷海光：《自由主义的趋向》，史华慈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19-22页。

手段,在科学探索与宗教信仰的对抗中鼓吹以实验为例证,在文化多元与思想一统中趋向自由选择。〔1〕

与欧阳哲生实际上是从自由主义者的行动取向的角度概括其特征不同,胡伟希是根据自由主义者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或其思想属性来把握的,比如他曾把严复这个“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真正开创者”的思想特征概括为: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伦理观上的个体主义、历史观上的进化观以及经济思想上的放任主义,并特别指出:“这些特征,对于了解整个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普遍特点来说亦具意义。”〔2〕相比之下,许纪霖为中国自由主义者设定的门槛要高一些,他重在强调自由主义者是否具有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严复、梁启超也宣传介绍过西方的自由主义学理和思想,不过,自由主义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权宜之计,而非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严格说起来,严、梁并不是自由主义者,只能算作自由主义的先驱。只是到了‘五四’时代,当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自由、理性的价值在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得到普遍确认,而且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时,中国方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3〕

周策纵则把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当作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立场”。他分析说,这些所谓“自由主义者”,有些在思想方面可以划入激进派,但在行动上较偏重于制度化的民主方式。有些以前受过英法自由主义和立宪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如严复、

〔1〕 欧阳哲生:《中国近代文化流派之比较》,《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

〔2〕 胡伟希等:《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3页。

〔3〕 许纪霖:《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第8期。

章士钊等,裹足不参加新改革运动,并常放弃他们早期的信念,其他采用自由主义观点的著名知识分子领导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则受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完全不曾系统化地接触过自由主义。只有少数几位学者,如张慰慈、高一涵和陶孟和,比较熟悉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理论。这些自由主义的作家中,胡适是最浅明易懂和拥有广大读者的作家。其他杜威的门徒如蒋梦麟和陶行知也是颇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教育家。〔1〕

在以上对自由主义的界定或理解中,已经显现出了学者们在更多问题上的分歧,比如,在中国自由主义兴起的时间问题上,以胡伟希为代表的学者既然以严复为中国第一代的自由主义者,那么自由主义兴起的时间就可以从戊戌维新时期算起,而以许纪霖为代表的则认为“如果要追溯中国自由主义的起源,应该从五四算起”〔2〕。再如,关于中国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问题,凡对界定自由主义的标准确立得相对宽泛些的,就比较易于做出肯定的回答,反之,则是否定的。如谢泳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宣布:“自由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它是说理的,它是商量的,它是温和的,它想让人多一点自由,多一点随便说话的地方。”他以一个人能否把学术与政治分开、能否在热情中保持理性这样相对宽泛的标准来检讨“胡适他们那一班人”,其结论是中国有自由主义的传统。〔3〕而雷池月则不仅强调自由主义必须具备“承认别人和自

〔1〕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17-318页。

〔2〕 许纪霖:《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遗产: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顾》,《开放时代》1998年第4期。

〔3〕 谢泳:《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书屋》1999年第4期。

己拥有一份同样的权利”、“以人的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等终极关怀的特征,而且对自由主义实际影响的考核也比较严格,认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确实曾经被引入中国并在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然而它不仅从未取得过主流的地位,甚至根本无法维持长久固定的形态——总是很快地分化到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这两个极端去。”所以他的结论是:“要确认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着一种自由主义的传统,寻找具有实证意义的群体表现实在难乎其难。”〔1〕

(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及其类型划分

与判定自由主义标准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哪些人有资格被视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殷海光那样宽泛的条件下,所谓自由主义者既包括胡适、吴稚晖、吴虞等五四前后的西化派人物,也可以包括严复、梁启超等更早一些时候的人,甚至谭嗣同这样的“思想不太成熟”的人也可以列名其中。〔2〕而在标准相对定得高一点的许纪霖那里,严复、梁启超等显然不能被称之为自由主义者。

在自由主义者的身份确认上,最有争议的是严复。有些学者,虽然在评论严复之于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功过是非上评价不一,但却承认他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由海外学者史华慈撰写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就是把严复当作一个自由主义者展开其相关讨论的。此外,袁伟时认为严复实际上“开启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两个传统”:一是珍视国家独立和富强,二是珍视个人自由与寻求国家民主化相结

〔1〕 雷池月:《主义之不存,遽论乎传统》,《书屋》1999年第4期。

〔2〕 殷海光:《自由主义的趋向》,《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第22页。

合。“在他的前期思想中,明确地表示议会制和各地的民主自治是救治中国的不二法门,也是开民智、新民德的必由之路。这个主张的理论基础是珍视个人价值……总之,这一时期的严复不愧是最早的自由主义者和与之一体两面的个人主义者。”〔1〕刘军宁在评价严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持守时也肯定了他的自由主义者身份:“除严复之外,儒学中不言利的倾向几乎在中国所有的自由主义者身上概莫能外地表现出来。从而除严复之外还没有其他人更能够配得上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2〕宝成关也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两大特点:工具主义、与西方古典主义严重脱节,可以追溯到严复那里,严复首开其端,后辈竞其余绪。”〔3〕与这些看法相左,另有研究者则否认严复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身份,除上述许纪霖的意见外,观点最鲜明的应以萧功秦为代表,他曾有针对性地指出:“一些国外的权威学者把严复称之为‘中国自由主义者’可以说是极大的误解。正是严复,认为中国长期专制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民性,作为中国的既存现实,使中国不能通过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实现富强。……如果仅因为严复称赞过西方自由主义而把他当作自由主义者,而无视这位思想家所主张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政治论,那无疑是本末倒置。”〔4〕还有的学者则将严复作早期和中晚期之分,“在他

〔1〕 袁伟时:《严复思想遗产三问》,《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2页。

〔2〕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2页。

〔3〕 宝成关:《严复与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

〔4〕 萧功秦:《“严复悖论”与近代新保守主义变革观》,《萧功秦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的早期,尤其是 1895 到 1902 年间,实际上是首要的自由主义改革家,是最先提倡西化、将现代科学方法、民主思想制度介绍到中国来和较先改革中国语言的人。他也曾较先反对科举制度和传统的儒家控制。但是在 1902 年以后,他逐渐转变为温和保守,赞成以教育方式来改革,而不赞成革命,并排斥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他相信中国古代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想有相近之处,因此应该好好保存。”〔1〕

对梁启超的看法也有类似严复的分歧。如张灏认为,梁启超“关心的焦点是‘群’这一集体主义概念,它几乎不可避免地妨碍他对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某些实质内容的领会。因此,毫无疑问,梁在《新民说》中最终提出的那些理想,归根到底很难称作自由主义。〔2〕”张汝伦则承认梁启超理解了西方自由主义之根本价值,虽然也指出梁启超时常将自由主义置于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大旗之下。〔3〕

随着多元价值在学界的确立,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明显地扩大自由主义者队伍的倾向。某些个人经历复杂或在思想史上扮演过“反动”角色的知识分子,如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勱等五四西化派的论敌或调和论的鼓吹者,多被列入自由主义者“栏”里。只是,基于他们的思想和性格的复杂性,研究者通常会做一些时间上或具体内容上的限制,如王元化在提醒学界应关注杜亚泉文化理论的价值时,主要针对杜氏发表的《物质进化论》、

〔1〕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 86 页。

〔2〕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6 页。

〔3〕 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3-134 页。

《伦理标准论》等文章说“他不仅是一个启蒙者,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1〕再如,邹小站是以《甲寅》时期为分析对象来展示章士钊的自由主义思想特征的。〔2〕丁三青则以1946年张君勱同意民社党出席“国大”为个案分析张氏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痛苦抉择过程。〔3〕当然,不赞同以自由主义者视之的也有人在,如雷颐曾以胡适和张君勱分别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代表,认为“‘科玄论战’实际上建构了中国近代文化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框架,而张君勱更是因此成为开‘新儒家’之先河的重要人物”〔4〕。否认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雷池月认为,许多出版物里之所以“闪耀一串用智慧和崇高包装起来的名字,如陈寅恪、胡适、吴宓、梁漱溟以及梁实秋、林语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不外是为了证明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实际的情形却并非如此。〔5〕

上述这些分歧与知识分子本身的特征分不开,由于他们的学理背景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传承不同,关注问题与表达问题的方式有异,思想和性格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面貌,甚至同一人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迥异的表现。这些差异无疑会影响到研究者的切入角度,致使对中国自由主义的类型划分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学术取向。胡伟希在1991年发表的文章中曾以自由主

〔1〕 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载 <http://www.zisi.net>。

〔2〕 邹小站:《章士钊〈甲寅〉时期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评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 丁三青:《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痛苦抉择》,《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4〕 雷颐:《殊途同归:胡适与张君勱的历史命运》,《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5〕 雷池月:《主义之不存,遗论乎传统》,《书屋》1999年第4期。

义者到底是把自由当作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为基点,将其分为工具型自由主义者、教条式或理念型自由主义者以及折衷型自由主义者三种类型。〔1〕在十多年后发表的题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类型》〔2〕的文章中,他又将自由主义者的类型划分为四种:一是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终极信念与原则去追求的思想理念型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严复和胡适;二是根据中国现实对自由主义加以修正的政治功利型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张东荪;三是以疏离政治的方式将自由主义理想贯彻在学术和教育中的学术超越型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潘光旦和陈寅恪;四是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进行批判性检讨的文化反思型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殷海光。

许纪霖受殷海光提出的“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概念的启发,认为可以将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分为两类:观念的自由主义者与行动的自由主义者。前者以胡适为精神领袖,这班人“极其自觉地保持着个人精神和身分的独立性,拒绝直接参政,拒绝成为‘组织人’,哪怕是组织反对党。”他们“习惯于学科化地讨论个别问题,拒绝思考改造中国的整体方案”。后者以张君勱、张东荪、罗隆基、王造时等为代表。这些人“对参政怀有强烈的兴趣,都自认为有治国安邦的卓越才能”,并“热衷于思考和设计整体性的社会政治改革方案”〔3〕。类似殷海光、许纪霖

〔1〕 胡伟希:《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基本悖论详述》,《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2〕 胡伟希、田薇:《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类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3〕 许纪霖:《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第8期。

这样对自由主义者作二分的研究取向在学界比较普遍,如张汝伦也把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思潮分作两脉:一条是以胡适为代表,以英美留学生为主体;另一条是从梁启超开始,经研究系到第三方面的自由主义。“二者的区别并不在长远有否留学经历,而在后一种自由主义更多地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更注重从中国的传统中寻找与发掘同自由主义理念较相契合的资源,而前一种自由主义基本照搬英美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所以,前者可称为‘西化自由主义’,而后者可称为‘本土自由主义’。”〔1〕研究者普遍认为,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其思想主要受杜威等人的实验主义影响,而以张君勱、罗隆基、王造时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则以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为思想渊源。

随着研究的深入,向来被视为同一流派的自由主义者也成为研究者比较的对象,如成庆的《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两种民主观——以张君勱和张东荪为例》〔2〕认为,张君勱和张东荪“在民主和宪政理念上存在分歧”,张君勱虽然修正了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但他却明显地“是遵循着自由主义民主的逻辑”。“在多个层面上,张君勱都显现出与自由主义民主观念近似的取向”。相比之下,张东荪的看法“与共和主义民主的观念架构颇为相似”,“张东荪一直都致力于对儒家政治传统的转化,我们似乎可以将他视作儒家式的共和主义者。”

(三)自由主义者的舆论干政

自由主义者尽管有如上所谓功利型和理念型等不同类型,但

〔1〕 张汝伦:《“第三条道路”》,《读书》1999年第4期。

〔2〕 《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